

用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经验应对新的财富结构挑战

郑有贵

〔摘要〕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及积累的独特经验，回答了如何应对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样一种新的财富结构及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和挑战。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经验有：一是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统筹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统筹国家、企业、个人等各主体的收益分配。三是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基础之上，统筹推进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这些经验，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厘清和丰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共同富裕 财富结构 经济社会发展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共同富裕的进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①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及积累的独特经验，回答了如何应对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样一种新的财富结构及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和挑战的问题。

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是与财富结构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这样一种新的世界财富结构引发诸多矛盾和挑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促进共同富裕，构建起发展优势，成功地转到跨越发展的快车道，突破了“贫困陷阱”和处于劣势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仍为主体，发达国家仍处于强势地位）的恶性循环的定律，成功地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至上的政策，以及难以解决有增无减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所积累的独特经验，主要有：不把促进共同富裕狭义化为抛开经济社会发展就居民收入分配调节谈居民收入分配调节；不仅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目标，还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把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和相互促进的实现路径；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把促进共同富裕纳入政府的职能，把公有制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石，统

^①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筹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基于实践复杂性探索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相统一的实现形式，不断探索完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是对共同富裕内涵的厘清和丰富，也表明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以及基于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面对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资本市场中的钱生钱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背离难有改观所导致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世界性难题，以及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应当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共同富裕，并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一、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统筹 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一条经验是，不把促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割裂成不相关的“两张皮”，而是把共同富裕既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探索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和相促进的实现路径。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能够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巨额资本拥有者不断扩大生产使供给增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工薪阶层需求又不能有效提升，这导致供需失衡乃至生产严重过剩，从而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于对金融资本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管所致，实质上仍然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导致的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继续加重，形成被2011年占领华尔街者所称的“99%”与“1%”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收敛态势，增长速度长时期平稳地保持在中高速及其之上运行，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更为严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促进共同富裕的取向，尽可能防止在改革中形成的资本拥有差异和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意义，也彰显了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经验之可贵。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力。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构建起人人能够成才和发展的公平社会制度下，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目标，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动力。这种凝聚力和动力机制是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探索形成

的。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所有制保障，由此有了探索形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机制的可能。其中，尽管由于在一些认识上的狭隘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但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民积极作为，为国家舍小家，积极主动地参与发展生产和改进技术等活动，形成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文化，依靠本国自身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为目标，先期从增量改革探路，在改革中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和形成上下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机制。例如，率先成功突破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农村改革，即是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尊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农民的选择。在国有企业则从实施国家与企业利润分成、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这些改革把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统一起来，有效地破解了生产经营中激励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微观经济组织实施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针对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的问题，一方面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并带动就业等保障全国人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改善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把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机统一起来，把共享发展成果的政策主张的体现由分配环节扩展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促进共同富裕之路更为清晰。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初步探索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形式，这正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改革开放深受全国人民欢迎而顺利推进的原因。

二、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 统筹国家、企业、个人等各主体的收益分配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二条经验是，不把促进共同富裕视为独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纯的收入分配调节，就居民的收入调节谈收入调节，而是以更宽广的全局视野和战略思维，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把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间的分配统筹起来。

这一重要经验是在推进赶超发展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远低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推进赶超发展，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并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由于弱势地位而遭受的多种形式的掠夺。

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构建起公平的社会，并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的结构性优势，选择并顺利实施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从而把局部利益的增进建立在全局利益的增进之上，把短期利益的增进建立在长远利益的增进之上。在实施“一五”时期156个工程项目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等重大建设项目时，按照“先生产，后生活”的顺序推进项目建设。在产业部门剩余分配上，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持等方式实现剩余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被通俗地称为农业养育工业政策。正是这一系列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才实现了国家的统筹积累，以此形成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体制机制，促进国家工业化战略项目的顺利实施。人民群众对这样的政策给予了理解和极大的支持，共同缩衣节食过紧日子，艰苦创业。换言之，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全国人民为国家富强这样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的结果，来之极为不易。这为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赢得了机会：世界离不开中国的趋势随之显现，世界之门向中国逐步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美国也与中国建交。赢得这样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也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推进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一重要经验由于实施了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被屏蔽，甚至一些人不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仅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这样一种分析逻辑，认为这不是经验，而只是教训。但是，如果不采取这些政策及保障其顺利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本积累就会缓慢甚至无法取得，也难以把资源向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方向的建设项目进行集中配置，中国何时能摆脱在国际竞争中弱势地位的困境？台湾大学颜元叔教授基于当时中国大陆发展的艰难困境，做出了这样动情的评价：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怎么出头？所以，4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4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仍然坚持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与改革开放前有所不同的是，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国家不再直接实施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项目，而是在市场机制下，通过税收等政策调节国家、企业、个人的收入分配关系，并通过政府支持、计划（规划）、政策、法律等综合手段的引导，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保障就业及由此实现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

三、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基础之上 统筹推进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三条经验是，把促进共同富裕建立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处理好劳动、资本等各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关系，并针对市场失灵，发挥政府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石。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没有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反而呈两极分化之势。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可称得上完善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实行资本至上，实行资本联合而非人的联合，实行劳动雇佣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按股决策，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决策权；企业收益按股分红，即剩余由主要资本分享。这种制度适应了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需要，成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基础，但也导致了资本独享剩余索取权与劳动创造价值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共同富裕之路。社会主义国

^① 颜元叔 《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

家的实践表明,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实行按劳分配,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力成为被雇佣的商品、剩余价值由资本分享而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这其中也有极其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没有正视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很落后而处于劣势地位,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处于发展期和强势地位,也忽视了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处于主导地位,忽视了国内产业、城乡、区域、阶层等多种发展不均衡及其引发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条件下,探索形成了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下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中国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仍较低及存在产业、城乡、区域、阶层等多种不均衡的国情,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没有被“华盛顿共识”所迷惑而走向苏联的私有化之路,而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有依托这一基础,才能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体现到政策的各个方面,也才能够在资本、劳动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条件下,能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政策取向,进而从长时段考察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政策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如何夯实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这样一种多种所有制的经济结构下,能否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促进共同富裕是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允许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行员工持股,旨在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为“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员工持股的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为“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在允许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的政策体系中,坚持以上政策目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实行员工持股,实现民有其股,可以把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所有制基础夯得更坚实,避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缩小和资本所得份额增加,从而保障全国人民在持续提高收入的过程中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中国就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有效探索,不仅着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台阶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扶贫促进贫困人口发展,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民生改善,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基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鲜明地将“促进共同富裕”明确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作用之一,不断完善人民共享的政策体系。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及所积累的经验,无疑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历史智慧。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的致辞中坚定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①。

面对世界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这一新的结构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中国要跨越各种矛

^① 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新华网2014年11月10日。

盾和风险明显增多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应当充分借鉴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历史经验，践行好包括共享发展理念在内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把收入分配的改善作为破解矛盾和风险日益增多的突破口，致力于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能够切实实现的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 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一书出版

由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世润教授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结题成果，对科学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大胆创新。全书从两个视角、即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视角研究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并在内容上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取得了可喜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两者关系的本质在于执政党在其治国理政的视域内如何认识历史的政治遗产问题，如何运用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政治遗产来维护并不断积累其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在研究内容方面，如第二章对“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价值”进行了大胆探索，提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发展的历史见证、红色资源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红色资源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资源、红色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生动范本、红色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支撑、红色资源是当前发展经济的重要推手等，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研究方法方面，除运用传统方法外，还借鉴和运用了经济学、信息科学等研究方法，尤其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关系模型。此外，该书还具有其他一些鲜明特色，如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外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郑志发/文）

schools for quality education. Failure to address these most important issue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will affect the consolidation of our state power and CPC's status as the governing party.

Response to New Adjustments in Wealth Structure with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Zheng Yougui (42)

China's practice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uniqu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respect provide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wealth concentration in the hands of a few and to the various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as a result of the new wealth structure. The main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cludes the follows: (1) Common prosperity is taken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with a balance between common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 Common prosperity h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its basis , with coordinated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the state ,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3) Common prosperity is preconditioned by the adherence to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 with coordinated adjustment i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 and improvement in social security. Such experience is a clar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of the n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oad , theory , 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d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s wel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n Rural China as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Base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CPC's Political Pow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Pan Wei (48)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in rural China is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base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CPC's political pow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Collective rather than state ownership of the rural land , while sufficiently recognizing the natur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of the rural areas , constitutes an effective restriction on the possible infringement of the farmers' interests by urban interests. It is the only means that guarantees equal allocation of farming and housing land , the last defense against capital's deprivation of farmers right to survival , an economic and social bond among the villagers , and a bridge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We should point out the lies that oppos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n the name of getting rich. Only through adhering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the rural land can farmers be organized and their interests effectively protected.

• **International Affairs** •

Why Trump Is Able to Go Up On the Historical Stage—Reflections on Trump ,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Fascism Ma Zhongcheng (53)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n explosion of all the economic ,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at had been accumulated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neo-liberal policies in the 1980s.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crisi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the entire capitalist system have been facing profound chang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neo-liberal policies , polariz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precedentedly intensified ,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Brexit in UK and the Saunders and Trump phenomena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acist tra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inducing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to support the monopoly capital , brought about support for Trump from both the monopolistic financial groups and large number of lower class voters.

The Class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Zhou Miao (62)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Donald Trump , has been widely talked about at home and abroad in terms of his candidacy , election , and hi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since the election. As the crisis of the accumulation system of American neo-liberalism ,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signals further decline of the accumulation cycle of US